

中國人才史鑒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序 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人才，它呼唤着大批人才的涌现。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党中央非常重视人才问题，反复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将人才问题与实现四个现代化，与国家的兴旺发达密切联系起来。近年来人才学方兴未艾，人才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至今已有一批论著问世。《中国人才史鉴》一书，是我们在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试图总结中国人才史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通过对历代人才实践、人才制度、人才思想的认识，引出必要的经验教训，作为今天制定人才政策的借鉴。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有关人才史的资料异常丰富。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非常重视用人问题，不断地研究、总结用人规律，有关人才的论述，散见于他们的宏篇巨著之中。这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地整理、研究这些珍贵的资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中国人才史鉴》在吸收时贤研究成果的同时，参以己见，希望对中国人才史的研究贡献我们一点绵薄之力。」

人才不能超越历史，任何杰出人才都是历史的产物，受着历史上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基

本上实行等级制度，主张任人唯亲，压制和扼杀人才。但在社会政治、经济激烈变革的时代，一个王朝开国初期、某些动荡时期，也多次出现过重视人才、人才辈出和人才思想活跃的局面。这些成就体现在：古代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对人才的地位和作用，人才问题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他们认识到“尚贤者为政之本”（墨子）、“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唐太宗），人才问题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是治乱的根本。坚持任人唯贤，不论亲疏贵贱，以德才标准选用人才，“惟贤是用”（张居正），“唯才是举”（曹操）。在德与才的关系上，更多的人主张注意德才兼备，以德行统帅才能。在选官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先秦的世袭制、秦汉的荐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以后的科举制的转换，日趋合理与完善。在人才培养方面，重视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与选官制度紧密结合起来，造就大批合乎需要的人才。在人才管理方面，采取试用制度、严密的官吏考核制度、官吏致仕（退休）制度。在使用人才方面，量才录用、扬长避短、循名责实、授以职权等等。中国古代人才史的这些成就，今天仍具有参考、借鉴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中国古代的人才制度、人才思想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最大的局限性是受到专制主义制度的制约。尤其在封建时代，人才策略的优劣，人才的状况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好坏，取决于皇帝个人的意志；甚至比较开明的君主，他的前后期，由于环境的改变、作风的变化，对待人才的态度也随之而改变。正由于封建时代一切以皇帝为轴心，因而封建皇帝摧残、压制人才的现象史不绝书。封建皇帝只

需要驯服的工具，除了个别皇帝外，都压制臣下的主动性、积极性。科举制度最终演变为腐败的八股取士，足以说明，封建皇帝只需要庸才。中国古代人才政策的另一弊端是轻视科技人才。特别是由于封建时代封闭的经济结构，专制的高压，儒家义利观的影响，视科技为淫巧，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闭关锁国状态被打破，西学东渐，新的生产力的出现，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随之而来的，出现了新的人才观与人才呼声。从魏源、改良派到孙中山，批判摧残人才的科举制度；批判专制制度压制人才；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主张突破传统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孙中山先生更提出了人才平等、人尽其才的主张。这一切，批判和冲击了封建的人才制度，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以进化论、天赋人权等为武器的近代人才思想，以及他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抵挡不住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中国的条件下，现代化人才的成长，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成功。

本书编写的分工如下：

序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李大生；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黄云峰；

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李书源。

由李大生负责文字定稿工作。

一九八九年六月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先秦——中国人才史的发轫期	(1)
第一节 奴隶制时代的人才观	(1)
第二节 从尊尊亲亲向尚贤使能演变的春秋时期	(9)
第三节 人才竞争的战国时期	(24)
第四节 战国诸子人才思想综述	(38)
第二章 秦汉——封建社会人才制度的确立	(51)
第一节 秦朝人才政策的得失	(51)
第二节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的人才策略	(58)
第三节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人才群体的出 现	(66)
第四节 刘秀的中兴大业与人才策略	(75)
第五节 两汉人才制度综述	(86)
第六节 王充《论衡》中的人才观	(97)
第七节 王符论防止“蔽贤”	(104)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的人才状况与人才政策	(114)
第一节 “人才莫胜于三国”	(114)
第二节 刘劭《人物志》第一部人才学理论 专著	(132)
第三节 世族门阀专政下的九品中正制度	(143)
第四节 两晋南北朝的人才状况	(157)

第四章	隋唐对人才制度的改革与封建国家的兴盛	(168)
第一节	隋朝的人才制度改革	(168)
第二节	“贞观之治”与唐太宗的人才政策	(171)
第三节	唐朝的盛衰与唐玄宗前后矛盾的人才政策	(182)
第四节	陆贽的人才观	(196)
第五节	唐代中央官制特点与官吏管理	(200)
第六节	唐代学校与科举制度	(212)
第五章	宋、元官僚制度对人才的压制	(223)
第一节	宋代人才制度对人才的压制	(223)
第二节	范仲淹、王安石人才改革与失败	(239)
第三节	宋代书院	(246)
第四节	元代人才歧视政策	(252)
第六章	明、清专制统治对人才的摧残	(259)
第一节	朱元璋人才政策的经验与教训	(259)
第二节	明代专制统治对人才的压制	(269)
第三节	明代学校教育特点与科举制度	(276)
第四节	清朝初期的“太平盛世”与康熙的人才政策	(283)
第五节	清代君主官僚机构与科举制的腐败	(292)
第六节	清代思想文化专制的加强与对人才的摧残	(303)
第七章	封建末世的人才凋零与人才呼声	(308)
第一节	万马齐喑的末世气象	(308)
第二节	国门打开后先进知识分子的人才呼声	(323)
第八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人才实践	(340)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人才制度与人才主张·····	(340)
第二节	得人才者得天下——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	(351)
第九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人才思想与人才实 践·····	(365)
第一节	传统人才观向新人才观的过渡·····	(365)
第二节	洋务运动中新式人才的培养与任用·····	(382)
第三节	近代科技人才的出现及其杰出贡献·····	(393)
第四节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人才实践的比较·····	(403)
第十章	资产阶级人才新潮的涌现·····	(416)
第一节	戊戌维新与资产阶级人才群体·····	(416)
第二节	革命造就人才 人才推动革命·····	(431)
第三节	孙中山的人才思想·····	(443)

第一章 先秦——中国人才史的发轫期

第一节 奴隶制时代的人才观

一、夏、商、周尊尊亲亲的用人原则

夏代前后是两种社会，以前属于原始社会，以后属于奴隶社会。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起，至周平王东迁，中国处于奴隶制时代。原始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本质变化，《礼记·礼运》记载了这些变化，作了一些猜测，较为合乎实际。关于人才观的区别，它说：“大同”社会（指原始社会）中“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小康”社会（指阶级社会）中“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原始社会是公有制，大家各尽义务，享有同等权力，部落联盟首长由民主选举产生，所谓“选贤与能”，是任人唯贤的原则；奴隶社会则是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剥削和国家，确立起世袭制度，所谓“大人世及以为礼”，是任人唯亲的原则。

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就反映了原始社

会晚期“选贤与能”，民主产生部落联盟首长的情形，《尚书》、《史记·五帝本纪》等历史典籍中，对此有一些弥足珍贵的记载。据说尧在位七十年时，召开各部落酋长（四岳）组成的联盟议事会，请求选出继任人选，有人推举尧的儿子丹朱，尧却以为丹朱“顽凶”不可用；尧又询问四岳：你们当中谁可以继位？四岳推辞，并一致推举出舜为联盟首领。举出舜后，尧仍然在位二十余年。尧正式退位后，舜同样通过相似手续，由各部落酋长推举出禹，舜和禹共事达几十年。尧与舜、舜与禹，都是相继在位，配合默契的两头军事首长。军事民主制下的军事首长，不同于后世的君主，他们经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对议事会负责，议事会的决议对联盟首领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如尧在一次议事会上请求各部落酋长推荐治水人选，四岳群牧一致推荐鲧，尧认为不合适，但大家坚持试用，尧也只好服从决议。不仅如此，尧、舜、禹作为部落联盟首领，是为“天下”操劳，不谋私利，本人并无任何特权，《韩非子·五蠹》说尧、禹“王天下”是苦差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韩非的为象尧、禹这样的“古之天子”，反而不如当今县令的权势地位，他们的“禅让”，是一种解脱，不值得称许。原始社会的酋长、首领，是为社会服务的，概由人民认可、公选，没有脱离人民。原始的“禅让”制、任人唯贤的精神，对阶级社会的人才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社会组织简单，原始社会选拔、任用人才的思想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根本不可能产生完备的人才观。

夏、商、周三代，王位及其贵族的政治特权是世袭的，实行尊尊亲亲的世袭制度。

夏代传子，以王位世袭取代了“禅让”制，《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杀之”，启破坏了传统的民主方式，以暴力手段夺取权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已设官分职，组织起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机构，依据《尚书·甘誓》、《左传》等材料，设置的高级官吏有“六事”（“六卿”）、“三正”、“左”、“右”、“御”、“御正”，下级官吏有“车正”、“牧正”、“庖正”等。夏代既然以“天下为家”，政权和族权紧密结合，夏王是最高的专制家长，君位世袭，下面的臣工也必然以血缘的亲疏来分配政治权力，实行任人唯亲的原则。

商代的政权系统与宗法系统是紧密结合的，表现出亲亲尊尊的特点。至少至商代后期即实行比较严格的传子制度。卜辞的特祭，称父子相传为“大示”（大宗），兄弟相及为“小示”（小宗），已强调宗子世袭和大、小宗统属关系的精神。商代的分封，有“内服”的诸妇、诸子或其它同族的大臣，他们世袭职务，长驻一地，逐步演变为比较独立的诸侯；“外服”的侯、甸、男、卫，多为服属于殷的异姓方国，不具有“裂土分封”的性质。商代官制，带有亲亲的性质。商王盘庚曾说：“人惟求旧”，“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① 这些与商王“共政”的“旧人”，就是商王

^① 《尚书·盘庚》。

朝的宗族贵族与一些异姓贵族。甲骨文的资料表明，商代的几乎全部重要官职都由族长或显贵担任，不少人又是商族同姓，甚至王族，并且世代承袭官职，无疑，商代的选官制度是典型的任人唯亲，实行世卿制度。

周初周公制礼，他继承了商代传统，又有所损益，大原则没有变。《春秋》说：“殷道亲亲，周道尊尊”，是说商代重视血缘纽带，周代重视政治隶属关系，商周两代的侧重点不同。其实周公制礼兼顾了二者，将尊尊与亲亲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恰如《礼记·中庸》解释周礼的精神实质是：“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周公发展了商代的宗法制度，以宗法族权加强巩固君权，使君权和族权紧密联系而又有所区别。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周礼规定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①的继承制度，国王、诸侯以嫡系大族长的身份团结族人，使他们成为自己统治的有力支柱，嫡庶之间既是同族兄弟关系，同时又是君臣名分，血缘关系要服从政治关系。

周初实行分封制，所封者基本上是周王的子弟、同姓，即所谓，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②诸侯授民授疆土后，即成为独立的国君，君位世袭，臣属于周王，按规定履行义务，并仿照周王依次分封子弟、同姓和亲属。周朝政权长期掌握在亲近贵族手中，实行世卿制度，选择辅佐国君的公卿，一定要在上层贵族圈子中

① 《公羊传》隐公元年。

② 《荀子·儒效》。

进行，西周时在王室执政的公卿大官，如周公、召公、毕公、毛公、祭公、荣公、卫侯、虢公等，无一不是周王的同姓子孙，周公、召公的后代世袭公卿官职。“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贵有常尊，贱有等威”^①成为不可动摇的原则。整个政权被大大小小的贵族所垄断，使周的政治统治显示出浓厚的宗法色彩。这一宗法统治秩序适如春秋时人所说：“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觝觥”。^②

奴隶制时代任人唯亲，并不排斥“臣仆用事”，在平民和奴隶当中选用杰出人才。商周一些贤明君主，为了有利于奴隶主统治，认识到不妨提拔个别“臣仆”，担任重要官职。商代开国者成汤所用贤宰辅伊尹，出身为有莘氏媵臣，是陪嫁奴隶，职务是庖人，他趁机以“割烹”作比喻，对成汤游说，受到赏识，举以为相。伊尹辅佐商王，由汤至大戊，历五世八王，协助商汤决策灭夏，教育商王太甲，巩固了商政权。他受到殷人极大尊重，在卜辞里，祭祀他的辞例很多，常与成汤享用同样的祭典。商王武丁即位，为扭转中衰局面，他把主要精力用于体察民情，思考大政方针和选择贤佐方面。他选中了一名版筑的奴隶，叫作傅说，“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③在西周成康之前，政权初建，亟需人才，比较重视用贤。“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

① 《左传》宣公十二年。

② 《左传》桓公二年。

③ 《史记·殷本纪》。

国克生，维周之祯，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①的诗句，表达了渴望人才的急切心情。这时期选官用人，还不那么局限于血缘关系内部，“凡周之士，不显亦世”，^②虽然不是贵族出身有功也可以世袭官爵。《尚书·立政》记载周公说：主管人事的“常任”，职责应是“俊有德”，注意选拔“成德之彦”、“吉士”、“常人”这些有德有才的贤人。成康以后，政局稳定，各方面步入正轨，在选举方面维护等级森严的宗法制，执行任人唯亲原则就更加坚决了。

二、西周选士制度

在《礼记》、《周礼》及其它先秦文献中，记载了西周选士制度。西周选士，分为乡的选士、诸侯贡士和国学选士几个方面。

关于乡的选士。《诗·小雅·菁菁者莪》第一章说：“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才，则天下喜乐之矣。”据毛注说：“乐育材者，歌乐人君教学国人秀士、选士、俊士、造士、进士，养之以渐，至于官之”，那么这首诗就是歌颂西周乡的选士制度了，它用旺盛的蒿草比喻人才的茁壮成长，赞誉执政者在国人中逐级选拔优秀者，长期加以培养，造就官材。乡的选士是从地方教化开始的，由中央主管文教的大司徒颁行“六德六行六艺”等教化内容于乡属州、党，乡大夫在每年正月初一领受教法于大司徒，退而颁布给乡吏，使其各自教化所属国人，考察其品德及技艺。把乡中德行昭著者，逐

①② 《诗·大雅·文王》。

一级上报，并以“书”的形式记录下来，以备录用官吏时参考。①西周地方选士，三年举行一次大考，即“三年大比”，由乡大夫主持，由下属推荐之人中，选出德才优异者向中央政府推荐，此项档案资料，“登于天府，内史贰之”，由政府部门妥为保存。②乡的选士标准，以德行为先，技艺次之，尊德行而轻技艺。乡选“秀士”，德行必有所长，否则不能贡于天子；只有一技之长者，虽亦在待选之中，但“不与士齿”，限于担任祝史百工之类的低贱职役。选出的士分为不同的等级和待遇。《礼记·王制》称：“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西周乡的选士，因道艺德行等表现不同，而有不同层次，或直接被任命为地方官吏，或升入国学深造。选士可以免乡中征役，造士可以免国中征役，有不服公事的待遇。

关于诸侯贡士。西周分封，大国三乡，次国二乡，小国一乡，相应的规定：大比之时，大国贡士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诸侯国的乡大夫无权直接向周王献“书”贡士，而是先献于国君，由国君在朝觐时贡于周王。大射择士由周天子主持，选在诸侯朝觐之时，目的在于通过大射考核诸侯贡士的质量，选拔所需人才，并以此作为考察诸侯政绩的一项重要依据。西周时期，十分注意诸侯贡士，不贡士者，一次贬，二次削地，三次则兴师问罪。③

① 《周礼·地官·乡大夫》。

② 《周礼·地官·司徒》。

③ 《孟子·告子下》。

关于国学选士。西周“学在官府”，学校分为乡学和国学两种。乡学是地方学校，称为庠、序。国学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礼记·王制》：“小学在宫之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大学由两类学生组成，主要是贵族子弟，其次是司徒荐入的庶士。国学选士同大学考试相衔接。《礼记·乐记》记载，西周大学规定隔年考试一次，至第七年考试合格者，称为“小成”，学生如在第九年达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称为“大成”，选其优异者荐于司马，即为“进士”。司马根据“进士”的表现，择其贤者上报于周王，然后任以官职，授与爵禄。实际上，只有贵族子弟才可以授官，定爵禄，平民出身的进士，只能达到授官的阶段，没有享受爵禄的资格，多担任府史胥徒一类下级官职。

西周选士制度，以德行为教化的主要内容，又区分了国学与乡学、贵族与平民的贵贱等级。贵族子弟可以世袭爵禄；平民子弟只能勤学待选，通过层层遴选，只有极少数人，有幸成为“进士”，担任下级官职。所以，西周选士制度，虽为极少数国人开辟了仕途，但并不是真正的“选贤任能”。就选士制度本身而言，它将教育与选拔结合起来，有一套比较严密的考核办法；将养士、选士、选官结合起来，士有所举，必有相应官职，鼓励平民阶级通过学习、选士而进入政权。这些特点，有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第二节 从尊尊亲亲向尚贤使 能演变的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而自诸侯出，进而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宗法血缘关系受到巨大冲击，尊尊亲亲的传统逐步被打破，世卿世禄制度衰落了，一部分逐渐采用封建剥削方式的旧贵族、军功贵族和新官僚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利用奴隶和平民的力量，向奴隶主展开了激烈地夺权斗争，士阶层成为政权的支柱。各国新兴地主阶级在争霸战争和夺权斗争中，需要改变世卿世禄制，注重用贤尚贤，逐步形成新的地主阶级的官吏选拔、考核制度。与这种演变过程相适应、随着学术思想的活跃，先后出现了晏子、孔子的尊贤、用贤思想。

一、尚贤使能风尚

春秋时期的尊贤政治，开风气之先的是齐国，紧随其后的有晋国，大凡各国有作为的君主和卿大夫，无不注意用贤、尚贤。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以盟主身份提出的盟约中，有“尊贤育才，以彰有德”^①，说明“尊贤”已开始成为风

^① 《孟子·告子下》。

气，为人们普遍承认。

齐国：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得力于出身平民的辅相管仲。齐襄公末年，国政无常，鲍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公孙无知弑襄公自立，管仲奉公子纠奔鲁。齐国平乱后先后召二公子归国，为阻止公子小白回国即位，管仲借鲁国军队要截于乾时，射带中钩，公子小白佯死得脱，先入齐立为桓公。齐桓公欲使鲍叔执掌齐国国政，鲍叔于是力荐管仲，他说：微臣是凡庸之才，如果打算治理齐国，必须起用管仲。“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忠信可治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冑执桴，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①桓公最初不肯，认为管仲是自己的仇人，恨不能得而甘心，怎能重用呢。鲍叔说：当时各为其主，如果赦免他，管仲照样忠于你，为你效命。齐桓公听从鲍叔，捐弃前嫌，向鲁国讨回管仲，亲自迎于郊外，厚礼拜为上卿，执掌国政。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偃一道治理齐国，富国强兵，修内政而寄军令，设轻重鱼盐之利，禄贤能，救燕、存卫、伐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②辅佐桓公成就霸业。齐桓公的从谏如流，用贤不避仇，鲍叔的知人之明与让贤足为千秋风范。

管仲深知霸业与人才的关系，极力促使齐桓公任用贤能。《说苑·尊贤》记载了管仲、桓公一段对话：桓公问危害霸业的是什么？管仲回答：“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

① 《管子·小匡》。

② 《史记·齐太公世家》。